

网络圈层分化与“偶然的个人”

——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看数字时代的个体困境

董伟武, 梁巧君

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西 南宁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11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3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15日

摘要

数字技术的深度发展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信息生产主导的新阶段, 网络圈层分化成为数字时代典型的社会现象。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偶然的个人”理论分析网络圈层分化通过认知、社交、认同三层面对个体的锁定, 发现圈层化成为数字时代个体新的“偶然生存条件”。在数字时代下摆脱圈层个体的生存困境, 需要个体主动破圈发挥主观能动性、平台规范算法承担治理责任、社会搭建桥梁构建跨圈层对话机制, 三方协同发力, 消解算法霸权与圈层固化的束缚, 让数字技术回归服务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 在数字时代的必然性中探寻个体自由发展的现实路径。

关键词

《德意志意识形态》, “偶然的个人”, 网络圈层分化, 信息分工, 算法

The Fragmentation of Online Communities and “The Contingent Individual”

—The Individual’s Dilemma in the Digital Age as Seen through *The German Ideology*

Weiwu Dong, Qiaojun Liang

School of Marxism,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Received: May 11, 2026; accepted: June 3, 2026; published: June 15, 2026

Abstract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has propelled human society into a new phase dominated by information production, with the fragmentation of online social circles emerging as a defining social phenomenon of the digital age. By applying the theory of “the contingent individual”

from *The German Ideology* to analyze how the fragmentation of online communities confines individuals across three dimensions—cognition, social interaction, and identity—we find that this fragmentation has become a new “contingent condition of existence” for individuals in the digital age. To resolve the existential predicament of individuals trapped within these circles in the digital age, three parties must collaborate: individuals must proactively break out of their circles and exercise their agency; platforms must regulate algorithms and assume governance responsibilities; and society must build bridges to establish mechanisms for cross-circle dialogue. Through this tripartite effort, we can dismantle the constraints of algorithmic hegemony and the solidification of social circles, allowing digital technology to return to its essential purpose of serving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ity, and thereby chart a practical path for the free development of the individual within the inevitabilities of the digital age.

Keywords

The German Ideology, “The Contingent Individual”, Online Community Fragmentation, Information Specialization, Algorithm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我们正处在科技快速发展、数字化和信息化相互交融的时代，数字技术以其颠覆性的力量重构了人类的交往方式与生存形态。毋庸置疑，数字技术造福了人类，打破了时间和空间限制，使世界各地的人都能在短时间内进行交往。但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在数字技术为人类社会带来便利与发展的同时，其背后的技术逻辑与资本逻辑也悄然催生了新的社会问题。在现实中，我们必须警惕数字技术发展带来的隐患：算法推荐的个性化导向不断收窄个体认知边界，固化的网络圈层加剧不同群体间的沟通壁垒，致使个体在数字空间看似拥有多元选择自由，实则深陷全新的生存束缚。从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偶然的个人”理论出发，审视数字时代网络圈层分化下的个体困境，能为解决数字时代的个体生存难题、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引导。

2. “偶然的个人”的理论探源

2.1. “偶然的个人”的基本内涵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偶然的个人”，它指处于偶然的生存条件下、从事着非自由自主性劳动的现实的人，是抽象的无个性的个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有个性的个人与偶然的个人之间的差别，不是概念上的差别，而是历史事实” [1]。因此，“偶然的个人”并非永恒的人类状态，而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集中出现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个第二大社会形态中。“在不同的时期，这种差别具有不同的含义，例如，等级在 18 世纪对于个人来说就是某种偶然的的东西，家庭或多或少地也是如此。” [1]马克思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贵族和平民的例子论证“等级”这个因素由确定性因素到偶然性因素的变化。但“偶然性”并非纯粹的消极概念，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的现实的历史实践活动本身内在性地蕴含着偶然性，偶然性是历史实践活动内在呈现出来的现实的可能性” [2]，这意味着“偶然性”也有积极的维度，并非只是被动受缚的状态，而是人的实践活动本身固有的“现实的可能性”。

2.2. “偶然性”的来源

“偶然性”根源于分工的出现和发展。首先, 分工导致活动与自主的分离。“这种力量压迫着人, 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原来, 当分工一出现之后, 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 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 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 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 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 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 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 [1]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分工使人“固守于某种强加给他的活动”, 个体被固定在特定的分工位置上, 个人只能在分工所划定的狭窄、有限的范围内活动, 个人活动不是基于自身意志和兴趣, 而是被分工强制分配, 其发展可能性被预先限定。其次, 分工还导致个人力量异化为社会力量。个人之间的关系采取了物的关系这种异化形式, 使物获得了外在于人的独立性, 成为控制个人之间关系的异己力量[3]。生产力的发展本应该使人更加自由、应成为人自主活动的力量, 但是在私有制和分工的条件下, “生产力好像具有一种物的形式, 并且对个人本身来说它们已经不再是个人的力量, 而是私有制的力量” [1], 个人丧失了一切现实的生活内容, 成了“抽象的个人”。最后, 分工导致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分裂, 加剧了竞争。分工的发展催生私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对立, 与个人真实利益相脱离, 无法真正代表个人的利益诉求。“有个性的个人与阶级的个人的差别, 个人生活条件的偶然性, 只是随着那个自身是资产阶级产物的阶级的出现才出现的。” [1]在分工和私有制的作用下, 个人不是作为自主的人, 而是作为阶级成员、分工角色存在, 个人身份、地位、命运由阶级地位与分工位置决定, 而非个人意志, 这让个体的生存与发展充满了偶然性。

2.3. “偶然的个人”的实质

“偶然的个人”处在“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发展阶段, 在个体摆脱了自然必然性, 获得形式独立的阶段后, 又陷入经济必然性的新束缚, 人被物化而异化, 成为无根浮萍式的“偶然的个人”, 所以这种独立只存在于形式上, 在实际中还无法达到。在资本主义社会, 个体相较于封建社会而言, 获得了形式上的自由和独立, 此时的个人在法律上是自由人, 不依附于领主、行会和等级, 也拥有形式上选择职业、迁徙等的选择权。但在实质上个人必须服从于社会分工安排, 接受资本和物的支配, 否则无法生存, 这并非出于人的自愿。马克思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形式自由背后的束缚, 指出“偶然的个人”拥有的自由是虚假的, 事实上“他们当然更不自由, 因为他们更加屈从于物的力量” [1], 这一阶段, 个人的生存条件并不取决于自身的意志和个性, 而由市场、竞争、阶级地位等决定。这些因素对于个人而言都是偶然的、外在的、异己的, 所以“偶然的个人”是形式独立而实质受束缚的。

3. 物质分工与信息分工的类比

《形态》中所阐释的“偶然的个人”, 其现实基础是 19 世纪以物质生产分工为核心的社会条件, 而数字时代的圈层困境, 则根植于 21 世纪以信息生产分工为核心特征的全新语境。将“偶然的个人”这一理论运用于解读数字时代的网络圈层现象, 并非简单地将信息分工与物质分工等同起来, 而是充分利用二者在结构逻辑上的共性, 进行启发性的类比分析。

3.1. 物质分工与信息分工的内在共性

第一, 均具有强制性限定作用。物质分工将个体固定在特定职业范围与生产位置, 使其难以超越既定活动边界。信息分工则通过算法与圈层结构, 将个体限定在特定信息接收、社交互动与价值认同空间, 二者都构成对个体发展的外部约束。第二, 塑造偶然的生存条件。物质分工下, 个人命运受阶级、市场、职业等外在偶然因素支配。信息分工下, 个体认知与身份被算法、平台、圈层所塑造, 同样呈现出“不由自身意志主导”的偶然性特征。第三, 均产生异己化支配力量。物质分工使生产力转化为独立于人的物

的力量。信息分工则使算法与数据成为支配个体认知与行为的数字力量,二者均体现“物象统治”的历史延续性。

3.2. 物质分工与信息分工的本质差异

首先,分工领域不同。物质分工以物质资料生产为中心,关乎体力劳动与职业角色分配。信息分工以数字内容生产与传播为中心,关乎注意力分配与认知结构塑造。其次,束缚方式不同。物质分工表现为显性制度强制,具有直接约束性。信息分工表现为隐性算法规训,以个性化服务的温和形式实现约束,更具隐蔽性。最后,自主假象不同。物质分工下个体自由极为有限。信息分工赋予个体形式选择权,容易造成“自主选择”的虚假感知,使个体在不自觉中被圈层锁定。

物质分工是19世纪“偶然的个人”的现实基础,信息分工则是数字时代圈层个体的存在条件。以“偶然的个人”理论阐释网络圈层分化,是历史逻辑的类比延伸,而非历史形态的简单对等。借助分工理论的分析框架,目的在于揭示当代个体被外部条件限定、自主发展受限的结构性困境,为理解数字时代的生存状态提供借鉴。

4. 网络圈层分化作为“信息分工”的新形态

4.1. 从物质分工到信息分工

《形态》中阐释的分工以物质生产力为核心,是在一定生产力的基础上进行的。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这种分工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塑造个体生存状态的根本力量,它决定了个体在社会中能够接触什么、不能接触什么,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不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将这种分工逻辑从物质生产领域迁移至当今我们的信息生产领域也同样适用。在工业社会,个体的自我认知和社会归属高度依赖职业角色,职业称谓如教师、工程师、企业管理者等取代姓名、籍贯等传统标识,成为他人认知个体、个体定义自我的第一参照,个体通过职业获得身份认同和社会位置。数字时代的个体通过圈层归属获得信息输入、社交关系和价值确认。在传统物质生产领域的分工领域,个体生而被抛入特定的分工位置,成为织工、铁匠、农民等。在信息生产领域,根据 *Digital 2025: Global Overview Report* 中的数据,截至2025年初,全球网络用户数量为55.6亿,占全球总人口的67.9% [4],“整个人类社会正经历着一场信息化、网络化和数字化的快速变迁和大转型” [5],个体被固定在特定的信息圈层,如成为数码圈、音乐圈、育儿圈等圈层里的一员,这是分工逻辑在数字时代的延伸和表现。总的来看,无论是在工业社会还是数字时代,无论是在物质生产分工领域还是信息生产分工领域,两者都有构成个体无法自主选择、却又深刻塑造其生存状态的“偶然条件”。

4.2. 网络圈层锁定个体的过程

网络圈层,是数字社会中,网络用户基于共同兴趣、价值认同、身份归属或利益联结,在算法推荐与平台机制作用下,于网络空间自发聚合形成的、具有相对封闭性、层级化结构与专属话语体系的动态虚拟社群形态。在数字时代,网络已经成为当前信息传播的主要阵地,网络圈层对个体的锁定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一是认知边界的固化,个性化的推荐算法通过个体在网络中所留下的痕迹如停留时长、点赞、评论、转发、收藏、完读率等明显可量化的参与指标,精准识别容易引发个体进行互动的内容类型,从而不断地为个体推荐类似如此“值得推荐”的内容,在这一过程中,“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替代式思考’”、短视频平台的“精准式投喂”正在弱化人的独立思考能力 [6],个体不再主动寻求多元的信息,而是被动接受算法推送的同质化内容,其认知范围被算法预先设定的信息圈层所限定,形成了难以突破的“信息茧房”。二是社交边界的封闭,在网络中,相似教育背景、价值观念的用户会自发聚集在一起,形成相对

封闭的交流圈子[7], 网上评论区的互动、创作模板的复制扩散、专属话语体系的形成, 容易使人们在讨论问题、发表意见的过程中确认自己的立场, 划定了自己的社交边界, 在社交边界内形成具有同质化倾向的圈层, 同质信息在群体内部得以高度循环, 而异质信息难以突破圈层壁垒。社交边界的封闭性进一步加剧了圈层的固化。三是认同边界的强化, 在网络圈层内, 个体通过“我是某个圈的人”来定义自身身份, 获得数字空间中的身份认同和情感归属感。但这种认同为个体提供归属需求的同时也会将其锁定在特定的范围内, 让个体的自我定义陷入单一化, 例如考研或考公圈的人, 通常会为自己贴上“我是考研人”“我是考公人”的身份标签, 有利的一方面是个体能在这种备考身份的支撑下在高压中找到同伴、共同前行, 不利的一方面是只关注考研或考公的信息, 较排斥其他出路, 陷入不考就没前途的困境, 人生受限于一赛道。

4.3. 圈层化作为数字时代的“偶然的生存条件”

圈层化的过程也是数字时代对个体进行“数字限定”的过程, 在算法构建的数字领地内, 用户不自觉地经受着自动化的算法治理。算法治理不是简单的技术管理, 而是通过各种概率预测, 对个体行为和认知等方面进行的全方位规训, 剥夺了主体的反身性空间, 也就是剥夺了主体挑战现实的能力, 让个体在数字空间中陷入被动接受的状态。数字时代的零工经济群体, 如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就是被“数字限定”的代表, 表面看起来摆脱了传统的企业管理制度, 不受老板的直接监管, 想不想工作、几点工作完全取决于自己, 好像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但实际上, 为了生存, 除了遵循平台算法给出的订单、路线与价格, 他们别无选择。平台算法通过数据计算, 不断压缩其工作时间、降低其劳动报酬, 个体的劳动行为完全被算法所支配, 看似自主选择权, 实则是被算法规训后的被动服从。这种虚假的自主权, 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所阐释的“偶然的生存条件”在数字时代的最新形态。

5. 从“偶然的个人”到“固化的圈层个体”的困境

5.1. 认知范围的持续窄化

全面、健康的认知形成过程, 需要不断与外部进行能量交换, 主动吸收异质信息、接纳多元观点, 在不同信息的碰撞与融合中, 形成全面、客观的认知体系。而在算法操控下的空间个体却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 系统中充斥着同质的信息, 排斥着异质的信息。从长期来看, 个体持续接触同质化信息可能导致自身思维模式逐渐固化, 难以突破既有的认知框架, 在面对复杂问题时, 就会表现为缺乏多角度思考问题的能力, 对自身认知的完善和全面发展形成一定的阻碍。“对圈外文化‘免疫’、对圈内文化‘免检’, 这种以网络圈层文化为自身信息取舍标准的选择倾向, 将导致网络圈层内容纵深垂直化与网络圈层文化持续小众化的文化生产模式。” [8]

5.2. 社会对话受阻

在传统社会共同体中, 群体凝聚力的形成大多来自共同的历史记忆、文化符号、价值理念等情感共鸣, 具有稳定性和包容性, 能够让不同的个体在共同体中实现和谐共处与有效对话。但在算法纵横的圈层中, 这种情感共鸣地位较低, 渐渐被一种对抗性刺激所取代, 即圈层内群体的凝聚力往往不是来自共同的热爱, 而是来自对某种对立对象的共同反对, 如宠物圈凝聚力的突然增强, 可能不是来自对宠物的共同热爱, 而是对社会上某件虐待动物行为的共同反对。这种基于对抗性刺激形成的凝聚力, 具有极强的排他性与不稳定性, 本质是通过树立外部敌人来强化内部的身份认同。这是一种“只要有共同的敌人我们就是好朋友”的联结方式。在相对封闭的信息环境中, 群体成员的观点不断被重复和强化, 又缺乏异质观点的情境下还极易触发群体极化效应, 具体表现为群体内观点趋向极端, 不同群体间对话难度增

加。这种现象在热点事件讨论中尤为明显,不同圈层的个体往往持有对立立场,且难以进行理性沟通。从整个社会来看,信息茧房可能会加剧观点撕裂和社会分层。由于不同的人群看到的信息不同,并在算法推送下反复强化自身认同的观点,无法接触到差异化的内容和更全面的视角,久而久之,在不同人群之间构建起一道信息墙,导致观点变得单一、狭隘,同时极端化的声音可能会越来越大,最终让整个社会的理性对话空间不断萎缩。

5.3. 偶然性从生存条件渗入认知结构

马克思与黑格尔最根本的分歧在他们对“条件”的理解上。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条件”是绝对精神发展的环节,具有抽象性与必然性。在马克思这里,“条件”是二重性的,作为偶然性的“条件”可能为“物象”所利用,也可能不为“物象”所利用,存在“物象中的条件”与“物象外的条件”的区分。而算法圈层正是“物象中的条件”的当代形态,它将个体的认知锁定在特定的圈层范围内,根据算法推荐的精准性,向个体传递“这就是你想看的”虚假的信号,让个体将算法推送的同质化信息视为必然的、合理的信息,使人的认知范围窄化而不自知。而要打破这种固化,恰恰需要那些未被算法吸纳的“物象外的条件”来支撑,例如跨圈层的异质信息。

6. 在必然性中寻找自由的可能路径

当私有制和分工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的时候,分工才会消灭。但消灭分工不是取消一切形式的分工,而是消灭那种将个体终身固定在特定活动范围、剥夺个体自主选择权利的旧式分工。分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合理的分工能够提升社会生产效率,推动社会发展,而“旧式分工”的核心问题在于其对个体发展的强制性与束缚性。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过程中,新型的产消合一者出现了,资本对劳动客体的独占权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劳动的自主性与创造性得到了一定的提升,这都为消灭旧式分工提供了一定的条件[9]。对于数字时代,我们并非要取消圈层本身,因为它是基于共同兴趣的社群形态,能够满足个体的情感归属与交流需求,其本身具有存在的合理性,我们需要打破圈层对个体认知的终身锁定,消解信息分工对个体的强制性束缚,让圈层成为个体发展的助力,而非个体自由的阻碍。破解数字时代下“固化的圈层个体”的困境,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需要个体、平台、社会三方协同发力,在数字时代的必然性中寻找个体自由的实现路径。

6.1. 个体要主动破圈

“算法霸权是指利用占有算法的优势地位支配和控制资源,导致算法权力的滥用和异化,使算法成为社会运行机制中的主导力量”[10],在这种霸权下,算法不再是中立的工具,而成为支配个体认知和行为的异己力量,限制个体只能在算法框定的范围内行动,超出即寸步难行。其反映了《形态》所说的“物象”统治的当代版本,算法成为“盲目的社会力量”,支配着个体的认知和行为。个体面对这种算法霸权,应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依托经实践验证的数字媒介素养方法与工具,主动破圈。首先在算法的设计阶段,个体要多尝试参与算法的设计和监管,通过合理、正当的渠道表达自身诉求,确保对算法设计拥有一定的决策权,充分考虑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下不同背景的人员情况,从源头上确保算法设计足够公正和合理。其次,要理性看待,提高对算法霸权的感知度,可以采用数据游击战术等方法进行有意识的认知突围,利用跨平台跳转、行为迷雾制造、主动搜索异质信息等方式如定期清空平台浏览记录、关闭个性化推荐、主动搜索跨领域关键词,打乱算法中的用户画像,避免被精准投喂和对算法的过度信任和崇拜,用批判的眼光理性看待。最后,应回归自身建设,培养主动寻求多元信息的意识,主动突破算法推荐的局限,例如使用多源信息对比工具,定期查阅不同来源的信息、关注观点各异的优质账

号、参与跨领域交流活动、走出网络圈层参与现实的社会实践等,通过线下公益活动、跨界沙龙等活动接触不同背景的群体,打破社交边界的封闭性。还可以使用时间管理与信息筛选工具,控制单一平台使用时长,过滤低质同质化内容,把时间投向多元信息获取。从被动接受到主动破圈,是个体在必然性中寻找自由的第一重路径。

6.2. 平台要规范算法

平台作为管理、治理算法的负责主体,在破解圈层固化、消解算法霸权的过程中,更要积极作为,主动承担起技术治理的社会责任,将规范算法落地为可量化、可考核、可监管的技术指标,让算法回归中性工具的本质,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支配人的发展。在推荐机制方面,平台要推动算法的多元化,在个性化推荐基础上引入多样性维度,结合用户兴趣点与内容特征,在推荐系统中加入多样和新鲜的信息,确保用户接触到不同立场的高质量内容。在为考研用户推荐备考内容的同时,推送职业规划、技能提升等方面的内容,让用户的信息视野不断拓展,打破信息茧房的束缚。同时,还要增强算法的透明度,保障用户的算法知情权和控制权。让用户能够了解算法推荐的内容和机制,增强用户对算法的理解和控制能力,让用户能够自主调整个性化推荐的强度,甚至关闭部分个性化推荐功能,真正实现对算法的有效控制。另外,要建立算法的内容审核机制,遏制极端化、同质化信息的传播,引导网络圈层的理性交流,打破圈层之间的对抗性黏结,为不同圈层的交流与对话提供技术支撑。最后,将信息多样性指数列入平台考核指标。信息多样性指数是衡量平台推荐内容多元性、异质性、公共性的量化指标,涵盖内容领域覆盖度、观点立场均衡度、公共信息占比三个维度。通过对用户接收内容中跨领域内容的占比、同一公共议题下对立立场优质内容推送的占比和政务咨询、科普知识等公共性内容的推送占比等信息多样性指数与平台的资质审核、流量分配、广告收益挂钩,如有指数不达标者则限制流量推荐、限期整改,倒逼平台优化算法。

6.3. 社会要搭建跨圈层对话的桥梁

历史实践本身蕴含着偶然性,所以圈层固化是有打破的可能的。社会在破解圈层固化、促进社会理性对话方面大有可为。一是社会要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引领作用。主流媒体具有权威性、客观性与包容性的特征,能够突破网络圈层的壁垒,成为不同圈层个体获取公共信息、进行理性对话的重要载体,引导个体突破圈层的认知局限,形成全面、客观的社会认知。针对社会热点,可以推出多角度解读专栏,呈现不同圈层的合理诉求,避免单一视角叙事,搭建公共认知桥梁。还可以开设“圈层观察”栏目,客观解读青年圈层文化,消除圈外刻板印象,促进相互理解。二是要培育多元的网络公共空间,鼓励不同圈层、不同观点的个体进行理性交流。社会要通过制度设计,规范网络空间的交流秩序,遏制网络暴力、情绪化攻击等不良行为,让不同圈层的个体能够在网络公共空间中平等对话、理性交流,在观点的碰撞中实现相互理解、相互包容。三是在数字公民教育方面,可以在中小学开设数字媒介素养必修课,覆盖算法识别、信息甄别、跨圈层沟通。高校开设有关数字时代个体发展的通识课,引导青少年理性看待圈层。同时还可以制作数字素养手册、短视频教程、互动测试小程序,降低学习门槛,方便公众自测提升。网络圈层的固化,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个体线上社交与线下社交的脱节,因此,社会搭建线上线下融合的交流平台,组织多样化的线下活动是非常有必要的,让不同圈层的个体可以在现实的交往中打破刻板印象,实现情感的共鸣与观点的融合,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圈层之间的对立,构建包容、和谐的社会关系。

7. 结语

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偶然的个人”到数字时代的“固化的圈层个体”,这是经典理论在当今时代的现实反映。网络圈层分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在更高生产力水平上的再现,即当物质生产的束缚

逐渐松动, 信息生产的束缚却悄然收紧, 算法推荐与网络圈层分化所形成的“信息分工”, 成为塑造个体生存状态的新力量, 让个体陷入了新的“偶然性”束缚。在算法主导的数字时代,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需要我们既保持对技术理性的清醒批判, 深刻认识到算法霸权与网络圈层固化对个体发展的束缚, 避免陷入技术至上的误区, 又保持对个体能动性的坚定信心, 充分发挥个体、平台、社会三方的作用, 打破圈层的束缚, 消解算法的霸权, 让数字技术回归服务人的发展的本质。

基金项目

《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互动实效性提升研究与实践: 2025 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项目[2025JGB106]。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71-580.
- [2] 李侦.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论域中的偶然性思想[J]. 浙江社会科学, 2025(11): 113-122, 13, 159-160.
- [3] 杨楹, 周世兴. 论马克思的“偶然的个人” [J]. 哲学研究, 2008(11): 22-26.
- [4] Kemp, S. (2025) Digital 2025: Global Overview Report. <https://datareportal.com/reports/digital-2025-global-overview-report>
- [5] 张伟. 从数字鸿沟到信息分化: 网络社会的圈层化及其阐释[J]. 理论月刊, 2025(12): 114-124.
- [6] 吴满意, 杨荣所. 数字时代人的主体性异化反思与复归逻辑——基于复调叙事视角[J]. 学术论坛, 2025, 48(6): 106-117.
- [7] 陈怡帆, 全广辉. 网络圈群化情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J]. 理论观察, 2025(7): 122-125.
- [8] 罗琳. 青年网络“圈层化”的时代特征、生成机制与风险防控[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2022, 41(3): 75-83.
- [9] 胡莹, 刘静璇. 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论析——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分工理论的视角[J]. 思想教育研究, 2022(4): 71-77.
- [10] 李伦, 张晓燕. 算法不公正: 问题类型与治理路径[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25, 47(5): 76-83.